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影响机制的回溯性研究

谭珺嘉¹, 常志朋¹, 陈闻鹤²

(1.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32; 2.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选取新冠疫情作为回溯性案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从政策本身特质和政策实施外部环境双重视角建立理论模型。基于 510 份回溯性调查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疫情防控政策本身特质、政策实施外部环境、公众的行为态度以及主观规范等关键因素均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发现, 行为态度在政策特质、外部环境和主观规范与公众政策遵从意愿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其中以政策特质通过行为态度影响遵从意愿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为有效提升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 建议从完善政策设计和执行流程、优化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条件、加强公众行为态度的正向引导以及深化研究数据的挖掘应用等多个层面制定科学决策。本研究不仅揭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策遵从意愿的形成机制, 也为未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政策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 结构方程模型; 遵从意愿; 政策遵从; 行为态度; 中介效应; 回溯性研究; 公共卫生治理

中图分类号: F 062.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2415/j.issn.1671-7872.24177



Retrospectiv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VID-19 Prevention Policy Compliance Intentions

TAN Junjia¹, CHANG Zhipeng¹, CHEN Wenhe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 selected as a retrospec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policy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s. Using 510 retrospective survey datase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fluencing public policy compliance inten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public policy compliance intention are exerted by key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external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s, public behavioral attitudes, and subjective norms. Furthermore, behavioral attitude is found to play a critic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olicy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bjective norms and compliance intention, with the mediating pathway from policy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behavioral attitude demonstrat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effec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s recommended to be develope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to enhance policy compliance, including the optimization of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policy execution,

收稿日期: 2024-10-14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 (AHSKZ2020D02)

作者简介: 谭珺嘉 (2000—), 女, 山东泰安人, 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

通信作者: 常志朋 (1978—), 男, 吉林榆树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引文格式: 谭珺嘉, 常志朋, 陈闻鹤.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影响机制的回溯性研究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2(4):458-468.

reinforcement of positive guidance for public behavioral attitudes, and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olicy compliance intention during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y system for future public health crises.

Keyword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mpliance willingness; policy compliance; behavioral attitude; mediating effect; retrospective study;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新冠 (COVID-19) 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政府迅速采取系列防控措施并得到公众积极响应,最终有效遏制疫情传播。虽然疫情已结束,但防控经验仍需系统总结以应对未来公共卫生挑战。在防控过程中,公众不仅是保护对象更是主动参与者,其行为意愿既影响短期防控成效,也关系长期抗疫成果巩固和社会秩序恢复。如何提升公众遵从性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成为重大疫情防控的关键研究议题。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记忆感受性调查数据,通过回溯性研究分析公众遵从行为的影响机制,对构建政策遵从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政策遵从的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其理论框架融合了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1]。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政策领域,运用犯罪经济学模型探讨如何提升纳税人遵从度并抑制逃税行为^[2]。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公共卫生领域,针对疫情防控政策下的公众遵从行为开展研究,识别出政府信任度^[3]、亲社会倾向^[4]、风险感知水平^[5]以及政府信息透明度^[6]等关键影响因素。在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影响机制研究领域,王璐瑶等^[7]基于恐惧诉求与威慑理论,证实健康威胁和制裁威胁通过风险感知显著增强居民防疫遵从意愿;吴进进等^[8]研究表明,政府疫情信息公开通过提升政策理解与政策满意度,正向增强公众对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Meng 等^[9]基于社会文化与保护性行动决策模型,揭示了文化偏见通过影响公众风险认知间接作用于保护性行为的机制。

现有研究在政策遵从领域存在明显的理论和方法局限。从研究视角看,多数文献仅考察单一因素对公众遵从行为的影响,未能构建整体性分析框架,且偏重组织层面的政策执行过程,对个体层面的遵从机制探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传统回归分析被广泛运用,随机森林模型等机器学习方法也证实了利他观念对高遵从行为的预测效力^[10],但能够同时处理多层次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仍然匮乏。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整合路径分析和

因子分析的双重优势,可同步检验观察变量、潜在变量与残差项的复杂关系,不仅能量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还能识别间接效应和总效应^[11]。鉴于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政策内生特质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回溯性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旨在为提升防疫政策执行效果提供科学依据,并为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积累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研究假设

1.1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源于 Martin Fishbein 的多属性态度理论^[12],后由 Martin Fishbein 和 Icek Ajzen 发展为理性行为理论,最终 Icek Ajzen 引入感知行为控制变量^[13]形成完整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影响个体行为意愿^[14],既往多用于健康行为预测,本文将将其拓展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策遵从行为研究。具体而言,行为态度指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情感评价倾向,当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持积极态度时,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遵从意愿。主观规范反映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即重要参照群体对其是否执行特定行为的期望。当公众认为遵从疫情防控政策能获得关键群体(如家人/社区)的认可时,其政策遵从意愿将显著增强。感知行为控制表征个体对实施目标行为所需资源与能力的评估。当公众确信自身具备执行疫情防控政策的知识、技能及环境支持时,其行为依从性显著提升。行为意愿则反映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实施该行为的主观概率,直接体现疫情防控政策遵从行为的执行准备度与持续性倾向。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实证研究^[15-17]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与行为意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18]表明,主观规范不仅对行为意愿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强化行为态度这一心理机制间接提升个体的遵从意愿。

综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行为态度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2: 主观规范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3: 感知行为控制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4: 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

H5: 主观规范通过行为态度中介作用间接增强遵从意愿。

疫情防控政策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系统,其效能实现受到政策制定主体、执行机制、内容特性、目标群体特征及实施环境等多维因素的交互影响^[19]。基于这一系统性特征,本研究将影响公众遵从意愿的关键因素划分为政策内生特质与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据此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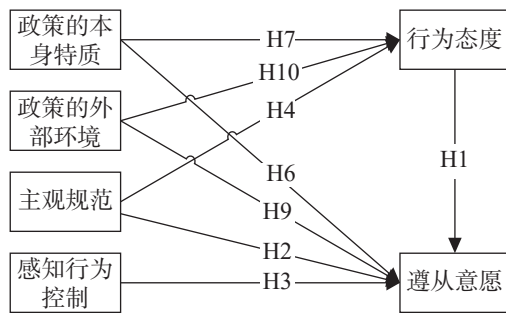


图1 公众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n public compliance intention with epidemic control policies

1.2 基于政策内生特质的假设

疫情防控政策的本身特质是政策本身具有的属性和特征,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制定程序、政策效果等方面。从政策主体看,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的公信力、合法性与强制力等主体特征上的;疫情防控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接纳和认同,主要依赖于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公正,如果政府主体“光说不做”,公众就会怀疑政策主体的能力和信誉,影响公众的遵从意愿。陈蒙媛^[20]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其政策遵从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在命令管制型政策遵从中,中央政府信任对公众遵从意愿具有更强的作用;在引导动员型政策的遵从中,公众则受到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谭九生等^[21]研究表明,与持有负面声誉的公共部门相比,公众对于具备正面声誉的公共部门展现出更高的遵从度。从政策制

定程序看,公众通过对制度的评价、感知或认知发展出信任的态度。只有基于对制度的信任,公众才能从内在激发出遵循的动力。徐彪等^[22]认为公众对疫情防控制度在合法性、公平性、有效性方面的感知会正向影响公众的制度遵从行为。从政策效果看,公众会基于实际政策效果而保持或调整后续的政策认同和遵从行为^[23]。当公众认为现有政策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并在不增加个人成本的情况下,会倾向于保持对政策的遵从态度;反之,公众对政策的认同度将下降,降低遵从意愿。

由此,提出下列假设:

H6: 政策本身特质对公众遵从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7: 政策本身特质对行为态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8: 政策本身特质通过行为态度间接正向影响遵从意愿。

1.3 基于政策外部环境的假设

政策的外部环境指在政策自身以外,政策目标群体感受到的、能够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的环境性因素,包括疫情防控政策的宣传和教育、疫情防控政策的信息公开和获取、防疫基础设施状况等。从宣传和教育的看,广泛而深入的健康宣传和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可以增强公众对疫情的了解,提升公众遵守疫情防控政策的意愿和能力。王璐瑶等^[7]研究表明,政府积极地开展疫情防控宣传,能够提高公众的威胁易感性和应对评估,避免公众对疫情防控掉以轻心。从信息公开看,疫情发展使公众对疫情的信息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政府的疫情信息披露可使公众更好地了解疫情相关资料,缓解公众的恐慌,同时认识到疫情防控政策遵从的重要性^[24]。李晓倩等^[25]研究发现,在公众友好型政府疫情信息公开条件下,公众对政府发布的防疫建议有更高的遵从意愿。从防疫基础设施看,核酸检测点的便捷性对公众遵从意愿有极大的影响,隔离措施的权益保障性也影响公众的遵从意愿。检测点位置分布广泛且易到达,公众更倾向于参与检测,遵守政策^[26];隔离措施能够很好地对隔离者的权益进行保障,实现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也会提高公众的遵从意愿。王磊等^[27]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物质保障,常态化的风险社会治理要求具备较强物理韧性的基础设施。另外,商场、医院等重大场所的消杀管理也会影响公众的遵从意愿^[28],有效的消杀管理能够传递出场所对卫生安全的重视,从而增强公众对场所的信任,使其更愿意配合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下列假设:

H9: 政策外部环境对遵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10: 政策外部环境对行为态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H11: 政策外部环境通过行为态度间接正向影响遵从意愿。

2 研究设计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并为后续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提供基础, 本研究遵循变量测量、数据获取

与样本检验、描述性统计等关键步骤。

2.1 变量测量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包含 6 个维度 24 个观测变量, 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 度量范围从“很不愿意”到“非常愿意”, 以全面反映受访者的态度和意愿强度。量表设计基于成熟理论框架, 并结合疫情防控实际情境进行适应性调整, 确保测量工具兼具理论效度和现实相关性。各变量具体测量题项见表 1。

表 1 变量的题项设定

Tab. 1 Item setting of each variable

项目	变量名称	编码	题项设定	变量赋值
被解释变量	遵从意愿	YY ₁	您愿意遵从疫情防控政策(包括戴口罩、主动报备、不聚集)	
		YY ₂	您愿意遵从疫情防控政策(包括隔离)	
解释变量	政策本身特质	ZC ₁	您觉得疫情防控政策规定表达准确恰当、条理清晰	
		ZC ₂	您觉得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程序符合法制化、民主化	
		ZC ₃	您觉得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程序公正公平	
		ZC ₄	您觉得政府具有较高的信息公开力度	
		ZC ₅	您觉得疫情防控政策有效地解决了社会问题(如有效遏制疫情蔓延、为患者提供有效治疗等)	
	政策外部环境	HJ ₁	您经常接受疫情防控教育	
		HJ ₂	您经常看到疫情防控宣传, 包括线下横幅、标语等宣传和线上网络宣传	
		HJ ₃	您能从经常使用的媒体平台获取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	
		HJ ₄	附近有核酸检测点	
		HJ ₅	有隔离点	
		HJ ₆	重点场所有严格的消杀管理	
	行为态度	TD ₁	您十分赞同防疫政策的相关规定	
		TD ₂	您认为遵守防疫政策有益于社会及自身	
		TD ₃	您觉得不遵从疫情防控政策是合适的	
		TD ₄	您觉得不遵从疫情防控政策不会对您产生影响	
	主观规范	ZG ₁	身边人都遵从防疫政策	
		ZG ₂	身边人反对您不遵守防疫政策	
ZG ₃		如果周围人都遵守防疫政策, 您也会和他们一样遵守防疫政策		
ZG ₄		学校、公司、小区等所处环境中对遵守防疫政策的公众宣传力度很大		
感知行为控制	GZ ₁	具有遵守防疫政策的条件和能力, 如自主去防疫点完成核酸检测		
	GZ ₂	您了解所在城市政府发布的疫情应对措施, 包括隔离手续、外省进入政策		
	GZ ₃	您觉得勤洗手、主动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并不麻烦		

很不愿意=1
不太愿意=2
一般愿意=3
比较愿意=4
非常愿意=5

本研究以公众遵从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 涵盖低成本遵从行为(如戴口罩、主动报备、不聚集等)和高成本遵从行为(如隔离)的意愿程度。基于吴进进等^[8]的遵从行为量表, 结合疫情防控特点对测量题项进行适应性调整, 确保量表能有效测度疫情背景下的公众遵从意愿。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涵盖政策特质(包括政策本身特征和外部环境)、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五大维度。其中, 政策特质指标体系的构建参考段文婷等^[15]的政策遵从理论框架, 涵盖主体特征、客体特征、政策特质和环境因素等关键维度。行为态度等计划行为理论核心变量则基于 Ajzen^[14]

的量表,结合疫情防控情境对测量题项进行优化调整,确保量表具有良好的情境适用性。

2.2 数据获取与样本检验

本研究通过线上调查平台和线下社区渠道共发放问卷 530 份,经严格筛选剔除无效问卷 20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10 份,有效回收率达 96.23%。

所有变量均采用量表测量,为确保数据分析的有效性,对量表质量进行严格检验。采用 SPSS 26.0 软件计算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量表整体 α 系数为 0.890,表明具有较高信度水平;各变量

α 系数均在 0.6 以上(见表 2),显示内部一致性良好。同时,对各变量进行效度检验,KMO 值为 0.882,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 $p < 0.05$,满足因子分析条件;限定提取 6 个因子($F_1 \sim F_6$)并使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结构,分析结果如表 2。结果显示:各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64.372%(>60%),且各因子包含的观测变量与本文研究因素对应,各观测变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均>0.6,表明结构效度良好。综上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要求,可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表 2 各维度信度检验及旋转成分矩阵

Tab. 2 Reliability test of each dimension and rotation component matrix

维度	Cronbach's α	编码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遵从意愿	0.739	YY ₁	—	—	—	—	—	0.831
		YY ₂	—	—	—	—	—	0.695
政策本身特质	0.848	ZC ₁	—	0.600	—	—	—	—
		ZC ₂	—	0.798	—	—	—	—
		ZC ₃	—	0.804	—	—	—	—
		ZC ₄	—	0.742	—	—	—	—
		ZC ₅	—	0.713	—	—	—	—
政策外部环境	0.829	HJ ₁	0.653	—	—	—	—	—
		HJ ₂	0.777	—	—	—	—	—
		HJ ₃	0.710	—	—	—	—	—
		HJ ₄	0.719	—	—	—	—	—
		HJ ₅	0.702	—	—	—	—	—
		HJ ₆	0.603	—	—	—	—	—
行为态度	0.807	TD ₁	—	—	—	0.622	—	—
		TD ₂	—	—	—	0.739	—	—
		TD ₃	—	—	—	0.777	—	—
		TD ₄	—	—	—	0.722	—	—
主观规范	0.829	ZG ₁	—	—	0.813	—	—	—
		ZG ₂	—	—	0.773	—	—	—
		ZG ₃	—	—	0.784	—	—	—
		ZG ₄	—	—	0.787	—	—	—
感知行为控制	0.725	GZ ₁	—	—	—	—	0.793	—
		GZ ₂	—	—	—	—	0.727	—
		GZ ₃	—	—	—	—	0.778	—

2.3 描述性统计

为探究不同人群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差异,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户口类型和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遵从意愿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 3。由表 3 可看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现出“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遵从疫情防控政策。

具体而言,公众对低成本遵从行为(如佩戴口罩)的意愿显著强于高成本行为(如集中隔离),前者积极意愿占比明显更高而消极意愿占比更低;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性别对低成本行为遵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和月收入对高成本行为遵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表 3 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compliance willingness towards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变量	选项	低成本遵从行为的意愿占比/%					p	高成本遵从行为的意愿占比/%					p
		很不愿意	不太愿意	一般愿意	比较愿意	非常愿意		很不愿意	不太愿意	一般愿意	比较愿意	非常愿意	
性别	男	0	1.6	8.8	19.2	16.7	0.034	0.6	3.1	8.2	20.2	14.3	0.187
	女	0	0.4	7.5	23.7	22.0		0.4	1.6	11.8	21.6	18.2	
年龄	18岁以下	0	0.2	1.4	2.0	1.4	0.279	0	0.6	2.2	1.2	1.0	0.007
	18~30	0	0.8	4.7	16.5	14.3		0.6	1.6	7.5	13.1	13.5	
	31~43	0	0.6	7.1	17.5	17.1		0	1.8	6.9	21.0	12.5	
	44~56	0	0.2	2.4	5.5	5.1		0.4	0.4	2.9	4.5	4.9	
	57岁及以上	0	0.4	0.8	1.6	0.8		0	0.4	0.6	2.0	0.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0	0.2	1.2	2.5	1.2	0.405	0	0.4	1.6	2.0	1.2	0.851
	高中	0	0.2	2.5	6.5	4.9		0	1.0	3.1	5.5	4.5	
	专科	0	0.6	2.4	6.7	7.1		0.2	1.0	3.5	7.3	4.7	
	本科	0	0.8	9.4	22.4	22.9		0.8	1.8	9.8	23.5	19.6	
	硕士及以上	0	0.4	0.8	4.9	2.5		0	0.6	2.0	3.5	2.5	
职业	国家公职及 国企员工	0	0.6	3.9	9.4	11.0	0.510	0.2	1.6	4.1	10.8	8.2	0.135
	非国企员工	0	1.4	9.6	29.0	22.0		0.8	2.4	11.6	27.6	19.6	
	学生	0	0.2	2.2	2.5	2.9		0	0.8	2.9	1.8	2.4	
	农民	0	0	0.4	1.6	1.8		0	0	1.0	1.2	1.4	
	其他	0	0	0.2	0.4	1.0		0	0	0.2	0.4	1.0	
户口	农村	0	1.4	7.1	14.7	13.3	0.111	0	1.6	8.8	14.5	11.6	0.208
	城市	0	0.8	9.2	28.2	25.3		1.0	3.1	11.2	27.3	21.0	
月收入	无收入	0	0.2	2.9	3.1	3.9	0.052	0	0.8	3.7	2.5	3.1	0.040
	4 000元以下	0	0.2	1.2	2.9	3.5		0	0.4	2.4	2.5	2.5	
	4 000~<8 000元	0	1.4	6.1	15.5	11.8		0.6	2.0	6.3	15.1	10.6	
	8 000~<12 000元	0	0	5.1	15.1	12.7		0.2	0.8	5.9	15.5	10.6	
	12 000元及以上	0	0.4	1.0	6.3	6.7		0	0.8	1.8	6.1	5.7	

注: ***, **, *分别表示 1%, 5%, 10% 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采用 95% 的置信区间, $p < 0.05$, 即认为在 0.05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y = \Lambda_y \eta + \varepsilon \tag{2}$$

$$\eta = B\eta + \Gamma\xi + \zeta \tag{3}$$

3 实证分析

基于 510 份回溯性调查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疫情防控政策遵从意愿的影响机制。首先进行模型适配度检验以确保模型质量, 继而分析变量间的路径关系以揭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 最后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1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基于变量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统计学方法^[29], 其基本设定如下:

$$x = \Lambda_x \xi + e \tag{1}$$

其中: 式 (1), (2) 为测量模型, 反映观测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关系。 x 为观测变量向量; Λ_x 为 x 对 ξ 的回归系数矩阵; e 为外生变量的测量误差向量; y 为内生观测变量向量; Λ_y 为 y 对 η 的回归系数矩阵; ε 表示内生变量的测量误差向量。式 (3) 为结构模型, 反映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 η 为内生潜变量向量; ξ 为外生潜变量向量; B 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效应矩阵; Γ 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效应的系数矩阵; ζ 为结构模型的残差向量。

3.2 模型适配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AMOS 24.0 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模型适配性检验结果如表 4。

表 4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Tab. 4 Model fit indices test results

指标类型	指标	参考标准	实测结果
绝对适配度	CMIN/DF(相对卡方值)	<3.00	2.814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	<0.08	0.060
	GFI(拟合优度指数)	>0.90	0.897
增值适配度	IFI(增值适配指数)	>0.90	0.913
	CFI(比较适配指数)	>0.90	0.912
简约适配度	PCFI(简约比较拟合指数)	>0.60	0.787
	PNFI(简约规范拟合指数)	>0.60	0.751

表 4 显示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CMIN/DF(相对卡方值)=2.814,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0.060,符合参考标准;IFI(增值适配指数)和 CFI(比较适配指数)的检验结果均>0.90,处于理想水平;PCFI(简约比较拟合指数)和 PNFI(简约规范拟合指数)的检验结果>0.60,符合理想标准;GFI(拟合优度指数)为 0.897,尽管 GFI(拟合优度指数)略低于 0.90,但其他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综合表明模型具有理想的适配度,满足假设检验要求。

3.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运用 AMOS 24.0 软件构建疫情防控遵从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各变量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如图 2,标准化结构路径系数的结果如表 5。通过路径图和标准化系数可直观了解各影响因素对疫情防控遵从意愿的作用方向及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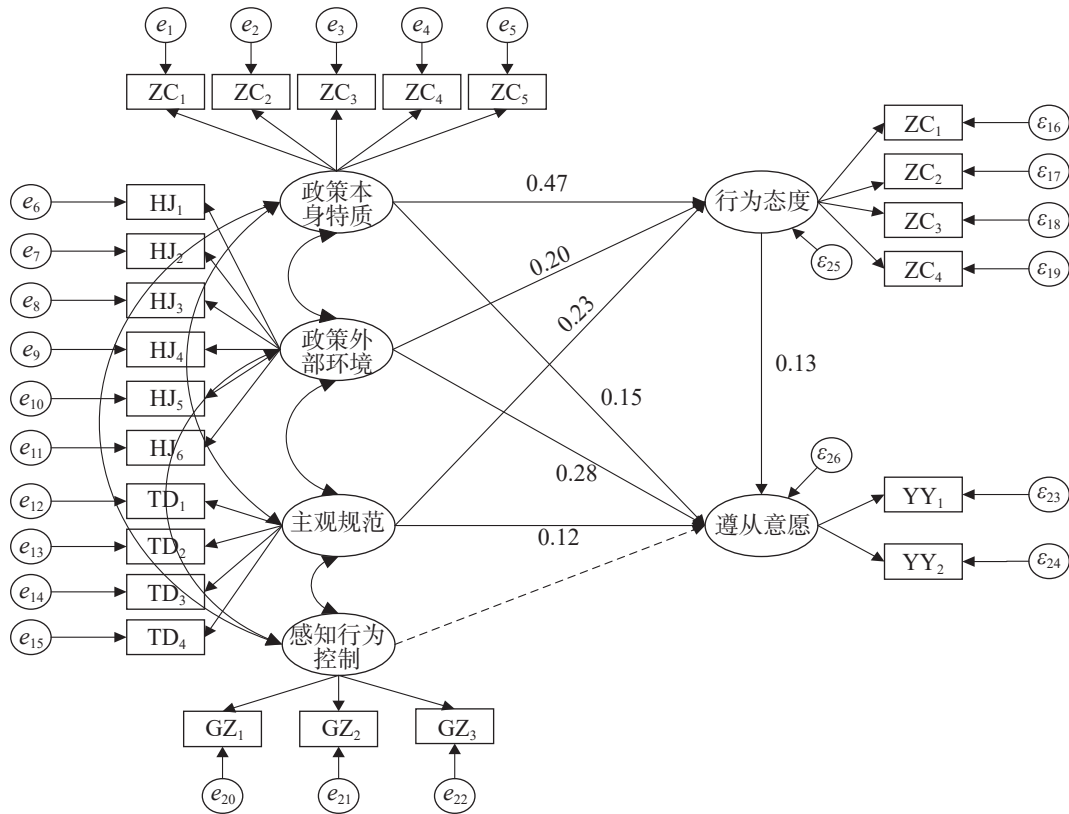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各变量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

Fig. 2 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e paths among variables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5 表明:行为态度对遵从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27,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1 成立。主观规范对遵从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2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2 成立;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3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4 成立。政策本身特质对遵从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5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6 成立;政策本身特质对行为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7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7 成立。政策外部环境对遵从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8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9 成立;政策外部环境对行为态度的路径系数为 0.19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 H10 成立。感知行为控

制对遵从意愿在 5% 的水平上不显著, 即假设 H3 不成立。疫情防控政策通常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 这种特性削弱了感知行为控制对遵从意愿的影响, 个体可能认为遵从政策是出于义务或责任, 而非基于个人的行为控制能力。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Tab. 5 Path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SE	CR	p值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论
遵从意愿	← 行为态度	0.127	0.057	2.235	0.025**	0.163	H1支持
遵从意愿	← 主观规范	0.122	0.051	2.420	0.016**	0.154	H2支持
遵从意愿	← 感知行为控制	0.095	0.066	1.432	0.152	0.090	H3不支持
行为态度	← 主观规范	0.233	0.048	4.864	***	0.228	H4支持
遵从意愿	← 政策本身特质	0.154	0.053	2.914	***	0.202	H6支持
行为态度	← 政策本身特质	0.470	0.063	7.492	***	0.483	H7支持
遵从意愿	← 政策外部环境	0.280	0.055	5.121	***	0.332	H9支持
行为态度	← 政策外部环境	0.199	0.062	3.230	***	0.184	H10支持

注: SE为标准误差; CR为估计值与标准误差的比值。

3.4 中介效应分析

表 5 和图 2 显示模型存在中介路径。本文采用 AMOS 24.0 软件, 运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对

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设置抽样次数为 2 000 次, 置信区间为 95%,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6。

表 6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 6 Results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

影响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			百分位 Bootstrap 法			
			下限	上限	p值	下限	上限	p值	
政策本身特质 → 遵从意愿	总效应	0.214	0.048	0.122	0.313	0.001	0.118	0.308	0.001
	直接效应	0.154	0.062	0.024	0.269	0.023	0.022	0.265	0.028
	间接效应	0.060	0.035	0.005	0.145	0.006	0.006	0.146	0.031
政策外部环境 → 遵从意愿	总效应	0.306	0.066	0.186	0.440	0.001	0.190	0.443	0.001
	直接效应	0.280	0.065	0.164	0.412	0.001	0.164	0.413	0.001
	间接效应	0.025	0.016	0.002	0.064	0.029	0.001	0.062	0.038
主观规范 → 遵从意愿	总效应	0.152	0.055	0.051	0.272	0.002	0.049	0.268	0.002
	直接效应	0.122	0.055	0.024	0.241	0.016	0.019	0.234	0.020
	间接效应	0.030	0.016	0.006	0.077	0.017	0.003	0.067	0.031

根据表 6 可知: 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明政策本身特质、外部环境和主观规范对遵从意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 即假设 H5, H8, H11 成立。根据效应值进一步看出: 政策本身特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遵从意愿相应提升为 0.214; 政策外部环境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遵从意愿相应提升 0.306; 主观规范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遵从意愿相应提升 0.152。由此表明政策外部环境对遵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为进一步研究各路径的中介效应及其占比, 将具有中介效应的变量路径关系用图 3 呈现并设定路

径: M1 为政策外部环境 → 行为态度 → 遵从意愿; M2 为政策本身特质 → 行为态度 → 遵从意愿; M3 为主观规范 → 行为态度 → 遵从意愿。根据“中介效应占间接效应的标准化系数/总效应的标准化系数”可得中介效应占比。路径 M1, M2, M3 中介效应占比分别如下:

$$M1: \frac{0.199 \times 0.127}{0.199 \times 0.127 + 0.280} \times 100\% = 8.28\%$$

$$M2: \frac{0.470 \times 0.127}{0.470 \times 0.127 + 0.154} \times 100\% = 27.93\%$$

$$M3: \frac{0.233 \times 0.127}{0.233 \times 0.127 + 0.122} \times 100\% =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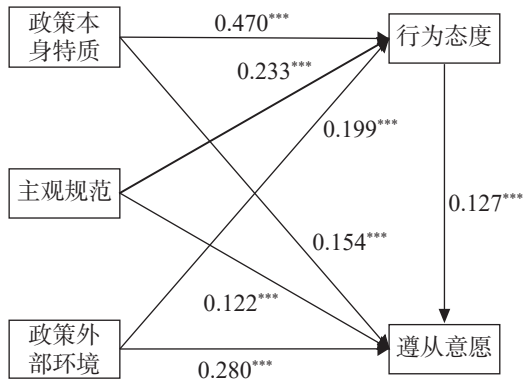


图3 中介效应路径

Fig. 3 Intermediation effect path

综上所述:行为态度在政策本身特质、外部环境、主观规范与遵从意愿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政策本身特质通过行为态度产生的传导效应最为显著。

3.5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运用Stata 18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由表7可看出:政策本身特质、外部环境、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均在5%的水平上对遵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经替代计量方法验证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支持了结果的可靠性。

表7 多元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Tab. 7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系数	系数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常数	0.645	0.257	2.51	0.012**
政策本身特质	0.167	0.050	3.35	0.001***
政策外部环境	0.285	0.048	5.89	0.000***
行为态度	0.166	0.053	3.12	0.002***
主观规范	0.129	0.043	2.99	0.003***
感知行为控制	0.104	0.044	2.38	0.018**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基于510份回溯性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政策本身特质、外部环境、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均对遵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在政策特质、外部环境、主观规范与遵从意愿间发挥较为显著的中介作用;行为态度在政策特质、外部环境、主观规范与遵从意愿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政策特质通过行为态度传导的中介效应尤为突出。

4.2 政策建议

为增强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优化疫情防控政策设计和执行机制。一是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政府牵头,联合医疗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组建多学科咨询团队(包含公共卫生专家、社会心理学家等),全程参与政策制定,通过跨学科协作确保政策方案既符合科学规律又切实可行。二是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全面公开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决策流程和预期效果,并建立常态化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会、线上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征集社会意见,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提升政策认同度,从而增强政策公信力和执行效能。三是强化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建立分级分类响应机制,基于疫情实时监测数据实施差异化防控。通过动态预警和数据研判平台,及时调整政策强度与实施范围,在保障防控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公众正常生活的干扰。

2) 优化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一是强化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政府部门通过权威媒体、政务新媒体等多元渠道建立疫情信息实时发布机制,确保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有效消除公众疑虑并增强社会认同;同时,通过正面宣传和典型事例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和遵从意愿。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保障机制,政府加大对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确保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步建立社会支持体系,为受疫情影响群体提供心理疏导与经济援助,通过减轻实际困难增强社会信任度。

3) 强化行为态度的正向引导。一是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通过开展防疫知识普及和科学防护技能培训提升公众防疫素养;同时通过典型事例宣传塑造积极社会示范效应,激发公众自觉遵守防控政策的内生动力。二是构建激励约束并重的行为引导机制,对模范遵守防控政策的个人及集体给予物质奖励与公开表彰,同时对违规行为实施分级惩戒并公示典型案例,通过正反双向调节引导公众规范行为习惯。

4) 深化数据结果分析和应用。一是完善数据治理体系,重点提升政策遵从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力,运用机器学习等技术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与作用规律,同步建设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多源信息的标准化整合与智能应用。二是建立动态政策评估机制,基于多维度数据分析,定期开展防控政策的

成本效益评估与效果追踪,通过横向比较筛选优化实施方案;同时构建政策效果实时反馈系统,确保防控措施及时响应疫情变化与公众需求。

参考文献:

- [1] 李燕. 公民政策遵从: 理论基础、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J]. 探索, 2020(3):156-169.
LI Y. Citizen policy compliance: theoretical basis,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J]. Probe, 2020(3): 156-169.
- [2] ALM J, MCCLELLAND G, SCHULZE W. Why do people pay tax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2, 48:21-38.
- [3] BROUARD S, VASILOPOULOS P, BECHER M. Sociodemographic and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compliance with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measures in France[J]. Can J Polit Sci, 2020, 53(2):1-6.
- [4] 刘艳妮, 郝艳华, 王子予,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文化价值观与公众遵从行为: 情绪的中介作用[J]. 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 2024, 10(2):75-81.
LIU Y N, HAO Y H, WANG Z Y, et al. Cultural values and public compliance behavior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Hygiene Rescue (Electronic Edition), 2024, 10(2):75-81.
- [5] SEMPLE T, FONZONE A, FOUNTAS G,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cottish residents' compliance with COVID-19 travel restriction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3, 178:103842.
- [6] XU D Q, LI J Y, LEE Y. Predicting publics' compliance with containment measures at the early stages of COVID-19: the role of governmental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cynic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22, 16(3):364-385.
- [7] 王璐瑶, 刘晓君, 徐晓瑜.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中居民防疫制度遵从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恐惧诉求与威慑理论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2(7):58-69.
WANG L Y, LIU X J, XU X Y. Research on residents' compliance intention to pan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ormal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based on fear appeals and deterrence theory[J]. China Soft Science, 2022(7):58-69.
- [8] 吴进进, 马卫红, 符阳. 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政策遵从意愿?[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 13(3):65-83,195.
WU J J, MA W H, FU Y. Do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ffect public willingness to comply with policie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13(3):65-83,195.
- [9] YUAN M, MAYORGA M, JOHNSON B B, et al. Explaining compliance with COVID-19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biases, political trust, and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protective ac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24, 44(2):284-326.
- [10] 宁良文, 郝艳华, 刘泽, 等. 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我国公众高遵从行为影响因素重要性研究: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J]. 中国公共卫生, 2021, 37(7):1096-1100.
NING L W, HAO Y H, LIU Z, et al.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public compliance behavior in China during regula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epidemic: a random forest model an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21, 37(7):1096-1100.
- [11] 钟云华, 王骄华. 大学生创业意向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的定量考察[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3, 22(1):89-99.
ZHONG Y H, WANG J 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dynamic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3, 22(1):89-99.
- [12] FISHBEIN 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eliefs about an object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that object[J]. Human Relations, 1963, 16(3):233-239.
- [13] HILL R J,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7, 6(2):842-844.
- [14]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Action Control.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85.
- [15] 段文婷, 江光荣.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16(2):315-320.
DUAN W T, JIANG G R.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16(2):315-320.
- [16] 马晓薇, 刘于飞, 袁俊, 等. 广州市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早期禽类从业人员知识、态度、行为分析[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5, 19(6):593-596.
MA X W, LIU Y F, YUAN J,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mong live poultry traders during the early wave outbreak of human infected Avian influenza a H7N9 in Guangzhou City,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2015, 19(6):593-596.
- [17] 程祖瑶, 宋渝丹, 吴雨晓, 等. 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探讨接种人员为特殊健康状况儿童接种疫苗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J]. 中国疫苗和免疫, 2024, 30(6):14-72.
CHENG Z Y, SONG Y D, WU Y X,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immunization service providers' vaccination decisions for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a discussion

-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Chinese Journal of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2024, 30(6):14-72.
- [18] 王若兰.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公众疫情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2.
- WANG R L.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 [19] 李燕, 苏一丹, 朱春奎. 公民政策遵从研究述评: 基于“政策情境”与“行为特征”的二元视角 [J]. *公共行政评论*, 2021, 14(4):175-195,200.
- LI Y, SU Y D, ZHU C K.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itizen's policy compli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ntext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1, 14(4):175-195,200.
- [20] 陈蒙媛. 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策遵从 [D].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 2021.
- CHEN M Y. Social Trust, Government Trust, and Policy Compliance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 [21] 谭九生, 陈珊珊, 王利君. 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何以影响公民政策遵从?: 基于数字治理中公民信息采集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4(4):40-52,126.
- TAN J S, CHEN S S, WANG L J. Ca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impacts citizen policy compliance?: a survey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citizen willingnes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in digit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24(4): 40-52,126.
- [22] 徐彪, 张士伟, 郭宏骞, 等. 公众疫情防控制度感知对遵从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4):24-49.
- XU B, ZHANG S W, GUO H Q, et al.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influence of the degree of publ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ceptions on compliance behavio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based on COVID-19[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0, 2(4):24-49.
- [23] 姚瑶. 重大疫情社区防控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以唐山市路北区社区工作人员的调查为基础 [D]. 唐山: 华北理工大学, 2021.
- YAO Y.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in Major Epidemics: Based on a Survey of Community Workers in Lubei District, Tangshan City[D]. Tangsha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 [24] 夏孜乾. 政府信息公开度对政策遵从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分析 [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22.
- XIA Z Q.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Policy Compliance Behavior: An Analysis Based on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D]. Chengdu: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 [25] 李晓倩, 刘小雨, 戴乐融. 公众友好型政府信息公开: 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J].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5(3):57-83.
- LI X Q, LIU X Y, DAI L R. Public-oriented government-information disclosur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3, 5(3):57-83.
- [26] 陈为公, 王丽占, 张永亮,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协同治理网络韧性评价: 以新冠疫情防治为例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23, 33(4):140-147.
- CHEN W G, WANG L Z, ZHANG Y L, et al. Resilienc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vel coronavirus[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23, 33(4):140-147.
- [27] 王磊, 王青芸. 韧性治理: 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2(6):75-82, 111-112.
- WANG L, WANG Q Y. Resilience governance: the normal governance path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age[J].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22(6):75-82, 111-112.
- [28] 孔博, 赵刚. 新冠肺炎常态化下铁路防控要点及措施探讨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20, 30(S1):16-20.
- KONG B, ZHAO G. Discussion on key points and measures of railwa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normalization in COVID-19[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20, 30(S1):16-20.
- [29] 石荣, 姜泽.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管制员组内排班影响因素研究 [J]. *现代计算机*, 2021, 27(5):42-45,56.
- SHI R, JIANG Z.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TC team scheduling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J]. *Modern Computer*, 2021, 27(5):42-45,56.

责任编辑: 丁吉海